

□ 儒学与当代中国

● 特约主持人: 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

● 主持人话语: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认为, 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这个民族部分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 经济、文化等领域均获得了巨大发展, 民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从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出发,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儒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经进入到了“实然状态”, “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均与以儒学为主线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国际上“孔子学院”的相继挂牌,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学班”的开设, 儿童读经活动的开展, 国学通俗化热潮的出现, 一年一度的祭孔活动以至于书院办学方式的重现等, 均展示出“儒学复兴”的迹象。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儒学会有怎样的发展? 从上述问题入手, 《求是学刊》已于 2006 年第 6 期刊发了一组题为“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命运”的笔谈, 从本期开始增设“儒学与当代中国”专栏, 首期由海峡两岸的两位知名学者撰稿。

林安梧教授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 曾先后四十余次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 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不辞辛劳。林安梧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研究, 创意颇多。近年来他提出的“后新儒学”、“公民儒学”等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一文中, 林教授指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系统基本上还是一套以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智识化的儒学”, 其“良知的自我坎陷”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次序安排, 而不是实际的历史发生程序。内圣之学是在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 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 必然应有所调整。林教授反对以内圣为“体”, 外王为“用”的观点, 提出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两面。儒家传统并非只有内圣, 它对外王、事功, 进而对社会制度也很关注, 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内圣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而过分强调内圣之学以及由此而来的注重自我修养的心性学, 恰恰是儒家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地方。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暴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的异化, 林教授提出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在他看来, 新儒学的完成并不代表儒学已经发展完成, 而是表明新一波的儒学必须有新的发展。所谓后新儒学, 正是在新儒学之后, 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与历史社会总体为基底的一个新的发展。林教授认为儒学正处在“第三次革命”阶段, 在该阶段, 儒学应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 由“心性修养”转为强调“社会正义”, 在重视“君子”之前, 更得重视“公民”, 这一波儒学革命正是“公民儒学”的革命。

张祥龙教授有着深厚的西学、国学修养, 在中外哲学比较方面建树颇多。近年来他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的建议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张祥龙教授的《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主要围绕在普遍主义盛行的时代, 儒家如何理解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 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全球的文化间对话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主导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儒家是非普遍主义的, 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儒家与其他文明对话的立场与方式。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文化现实中复活儒家, 那么就必须尊重儒家的这个关键性的哲理特点, 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化间的关系。儒家对于生态破坏、道德滑坡、社会不义、可能的核灾难、生化灾难等等问题的对策, 主要出于它要保护自己和人类的生命依托——亲亲—仁民—爱物—礼乐—耕读—传家——的文化本能。真儒家不可能有对高科技的崇拜以及对全球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的无止境的追求; 真儒者是深刻意义上的农民、士子、艺术家和行王道的政治家的结合体, 不可能是唯利是图的全球化市场经

济的弄潮儿。在全球的文化间交往中,儒家除了采取非冲突的姿态之外,还坚持各民族文化必须相互尊重各自的原初生存方式,并把“终止对话的权利”作为文化间对话的前提。

在此需要声明,林教授和张教授的观点并不代表《求是学刊》以及主持人的立场,但是他们的高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儒家思想传统,探索儒学与当代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林安梧

(玄奘大学 中文系所,台湾 新竹市)

摘要: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暴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关键词:社会正义;公民;内圣功夫;自由意志;良知

作者简介:林安梧(1957-),祖籍漳州和平,生于台中市,玄奘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第四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熟通儒道佛,尤以中西哲学对比为视角从事后新儒学的理论缔造。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1-0013-08 收稿日期:2007-12-29

在本文中,我想谈谈我自己治儒学的一些心得,谈谈这些年来我所谓的“后新儒学”的基本立场。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目前儒学的发展有一些感受。儒学在这些年来其实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整体而言,仍然有不足之处。

很多谈良知学的学者在面对社会正义的时候却采取逃避的态度,甚至接受了社会的不义;他们讲求心性修养,但却顺势而趋^{[1][2]}。但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良知学不涉及社会正义论或儒家的良知学缺乏责任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儒家的良知学只有彼此相互存在的感通或情感的感动而已。事实上,儒学具有“责任”、“正义”等概念,只是在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责任、正义概念与现在公民社会意义下的责任、正义概念不一样。

一、新儒学的“内圣”无法开出“外王”

儒学不只是心性修养之学,我们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来谈儒学,也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去说

中国人如何作为道德的存在、良知的存在。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思考这种良知的存在,要如何走出心性修养的封闭圈子?如何进到生活世界?如何进入历史社会总体?又如何开出民主科学?我想当代新儒学,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系统一直在强调如何从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以知性主体涵摄民主科学。这种说法看起来是个很大的进展,但我以为这恐怕只是陷溺在以心性论为核心的诠释之下才构成作的系统。因为这是一个诠释构作的系统,再由此诠释构作的系统去强调如何开出。也就是说,在这样理解之下的中国传统图像或是儒学传统图像,是一套形上化了的、以心性论为核心的“知识化的儒学”,也可以说是一套“道德智识化的儒学”^[3]。

由这样的角度切入,如何开出民主和科学呢?我觉得这样的提法颇为曲折,因此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基本上是通过形而上的溯源方式所构造出的诠释系统,最后肯定人与宇宙内在的同一性,强调“道体”和“心体”的